

# “五四”时期的瞿秋白同志

王 江

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领导人之一，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英勇就义于福建长汀。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四人帮”蛮横地篡改历史，恣意向瞿秋白同志泼污。然而，历史毕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关于瞿秋白同志在党的历史上的功过，党中央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所作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早已作了符合实际的评价。本文仅就瞿秋白早期的思想，做一些浅陋的分析，借以批驳强加于他身上的诬蔑不实之词，也以此纪念瞿秋白同志牺牲四十四周年。

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破产的“士的阶级”的家庭里。在家境的贫寒、世人的冷眼中，他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形成了孤僻和多愁善感的性格特征。同时，他在自己的家乡——事实上也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深切地感受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一九一五年，当瞿秋白刚度过十六岁的生日，他的母亲为穷困所迫自尽了。曾唯一给他以温暖和关怀的母亲离开人世，给瞿秋白一个沉重的打击。正是由于早已千疮百孔的大家庭的彻底破落，在母亲死后的第二年，瞿秋白转道湖北到了北京，开始了生活道路上的第一次远行。

“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sup>①</sup>这是瞿秋白一九二〇年赴苏途中对这段生活的回忆感慨。大意如此的话，他后来也曾说过多次。这段时期，瞿秋白正在免费的俄文专修馆文科学习。由于这是“为自立生计的预备”，也由于“因研究国故感受兴趣，而有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而有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sup>②</sup>，他每天工作达十一小时以上，除勤奋学习俄文外，还研究包括“老”“庄”哲学、宋儒语录、《大乘起信论》在内的大量经籍。他生活在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可是，如他自己所说，一道“厌世”的高墙却将他拦在几乎与世隔绝的书斋里。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五四”前夜的一九一八年。这不禁使我们想起瞿秋白少年时代的一件事来：在他十四岁那年的“双十节”，到处张灯结彩，以为国庆，他却愤然糊了一只白纸灯笼，上书“国丧”二字，以发泄对辛亥革命后依然如故的黑暗社会的不满。这同此时埋头书斋的瞿秋白相比，表面看来，岂非判若两人！人们不禁要问：少年瞿秋白的勃勃锐气到哪里去了？难道他果真变成吕纬甫<sup>③</sup>似的失去抗争之心的人了吗？

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在瞿秋白当时极而言之“厌世”两个字后面，有着复杂的内容。只要我们不撇开当时具体的历史背景，就不难发现一些同“厌世”二字格格不入的

东西。

瞿秋白早在离开故乡之前，就深切地感到了“政治恶象的激刺，流动的文学思潮的堕落”<sup>④</sup>。到了北京后，“新官僚‘民国’的生活”又使他“受一重大的痛苦激刺”<sup>⑤</sup>，因而对辛亥革命完全绝望。辛亥革命的道路，显然不能救中国于危难之中。他过去在“双十节”糊白灯笼固然是一种反叛的举动，但除了发泄胸中闷气，却于事无补。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破产的“士的家庭”留在瞿秋白身上的烙印，又使他在当时不可能找出一条新的道路。现实是如此地使人深恶痛绝，那只好“躲进小楼成一统”了，而这就不可避免地感到寂寞和孤独。于是，他在痛苦中深思，在“世外”默默地观察着“世上”。而他之所以攻读经书和古代哲学不辍，也正是希望通过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研究，积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sup>⑥</sup>。所以，他的“厌世”，并非与世无争，而是为争斗作准备，尽管这种准备是那样的无力和不切实际。

不久，在这种清贫而又“枯寂”的生涯中，瞿秋白渐渐发现了一种“寄生”的色彩。当时，他同两个弟弟住在当小职员的堂哥家里，这使他常常为此不安。“社会问题的疑问——‘人与人之关系的疑问’”<sup>⑦</sup>，开始触动着这个由于社会和家庭原因而早熟的青年。与此同时，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的“五四”前夜，新文化运动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化：在思想上，它开始摆脱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在规模上，它更加宏大。这一股“非常汹涌”的浪潮冲击着中国的社会生活，也冲击着包括瞿秋白在内的一代青年。他开始从书斋里向外迈步了！

首先，他从“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sup>⑧</sup>当时，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陈独秀等正在各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鲜明的共产主义文化思想。据统计，一九一八——一九一九两年间，仅在《新青年》上刊载的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介绍苏俄的文章，就有一百三十多篇。毫无疑问，这些文章对瞿秋白的“新的人生观”的形成起了重大的启蒙和推动的作用。

那么，瞿秋白“正在形成”的“新的人生观”到底是什么呢？《多余的话》里，他曾写道：当时“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毋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sup>⑨</sup>这段话，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被一些批判文章断章取义地引用，以作为攻击早期瞿秋白的证据。我们则认为，瞿秋白的这段话是不确的。考虑到他写作《多余的话》时对自己早年投身政治的追悔（写下《多余的话》一月后，瞿秋白从容就义，说明他已战胜了一度产生过的动摇情绪），考虑到五四运动刚一爆发，瞿秋白立即以“不可思议的‘热烈’”<sup>⑩</sup>“卷入漩涡”，我们有理由认为，所谓“厌世主义”正是瞿秋白在“五四”前夜所摒弃的东西。他曾经有过一段消沉的时期，但是，他从未向旧势力妥协。正因为如此，那“许多新杂志”所宣传的共产主义思想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才能为他所接受，才能推动他思想上的“相当的进展”。如果认为这种“进展”的目标是“厌世主义”，那就等于是说这些使许多彷徨中的青年振奋的新思想反而使瞿秋白更加颓唐，也等于否认了瞿秋白在五四运动中勇猛冲杀的事实。我们认为，瞿秋白所说的“新的人生观”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世界观，也是“五四”前夜瞿秋白的基本思想倾向，而它最初的思想基础，是由于对辛亥革命的失望所产生的对现实的憎恶。尽管由于主观上和客观上的原因，这个世界观的形成

经历了一个彷徨的过程，但不愿作“旧时之孝子顺孙”的瞿秋白，毕竟在一步一步地摸索着前进。

五四运动如一声春雷，震撼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瞿秋白“孤寂的生活打破了”。他立即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他参加了五月四日天安门广场的示威游行。其后，他被推选为俄专代表去请愿，并因此遭到军阀政府逮捕。此外，他还同瞿菊农、郑振铎、耿济之等同志创办了《新社会》旬刊。这个刊物影响颇大，曾远销四川和东北等地。刊物上，几乎每一期都登载有瞿秋白的文章。这些“尖利异常的正面攻击，或明讽暗刺的文章是《新社会》里最有份量的。”<sup>⑩</sup>据郑振铎后来回忆，这些文章“开头还谈些青年修养，介绍些科学常识；到了后来，却完全鼓吹起社会改造、家庭革命，向当时统治者直接进攻了。”<sup>⑪</sup>而“当时统治者”显然是不能容忍这种“犯上作乱”的刊物的，所以不久即被取缔。

瞿秋白的翻译活动，亦开始于此时。他最早的译作是翻译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闲谈》（载1919年《新中国》杂志一卷五期）。到赴俄前夕，共译托氏和果戈理等人作品八篇。从瞿秋白的选择来看，是偏重于暴露社会黑暗的作品，这使他的翻译活动从一开始就服务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这一目的。还须指出的是，瞿秋白是最早直接从原文翻译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的经过选择的、准确、生动的译作，既寄托了早期瞿秋白的所憎所爱，也对“五四”时期的读者认清封建社会的罪恶产生了一定影响，且为丰富“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写下了值得注意的一笔。

五四运动给予瞿秋白的教育是深刻的，多方面的。正是五四运动，也只有五四运动，才使他清楚地看见，二十世纪初叶的整个中国社会（而并不是他过去所看到的社会生活的某几个方面），腐败得仿佛“中了无名毒症”<sup>⑫</sup>，才使他深切地感受到了“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sup>⑬</sup>。也正是由于对社会腐败的憎恨和身受帝国主义压迫的痛苦，开始触醒他的“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使他深深地思索为什么“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sup>⑭</sup>。不久，李大钊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瞿秋白“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sup>⑮</sup>，并且成为其中一个活跃的成员。后来，他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学生运动中所受的一番社会的教训，使我更明白‘社会’的意义。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sup>⑯</sup>在这里，瞿秋白没有讲明“社会的教训”是什么，但不言而喻，他指的是为爱国而请愿却遭逮捕以及鼓吹社会改造的刊物被查禁。这个教训和引起他“无限兴味”的讨论使瞿秋白认识到“当时（即五四运动——引者）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地去解释它”<sup>⑰</sup>，因为，“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sup>⑱</sup>在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瞿秋白已经比较自觉地瞩目于整个社会问题了。换言之，社会革命不应该是一句抽象的空话，它有着具体的包括上面所引的那些在内的内容，而各项内容又是相互联系在一起。所以，五四运动所喊出的口号，就不能“望文生义地去解释它”。“打倒孔家店”，是为了摧毁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而“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也决非仅仅满足于

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和痛打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瞿秋白感觉到，五四运动给中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这使曾经在黑暗中痛苦摸索的他，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这就是“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sup>②</sup>。

“光明的路”到底在哪里？这也正是当时许多有志青年共同探索的课题。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许多人都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的近邻——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苏俄。瞿秋白也是其中之一。在瞿秋白看来，“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引者），只赚得一舆台奴婢匪徒寇盗的独裁制”<sup>③</sup>，而发生在“饿乡”（即俄国）的十月革命却使“一线的光明……照遍了大千世界”<sup>④</sup>！所以，能够到那“灿烂庄严，光明鲜丽”的“新国家”去，对瞿秋白来讲，“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如他自己所说，这是他“彻悟”的开端。不久，由于职务的原因，他得到了一个去苏俄参观访问的机会。

当然，我们还不能说，赴俄前的瞿秋白已经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信仰。应该看到，此时，他的思想状况仍然是复杂的，矛盾的。他既开始接触并倾向于社会主义，又错误地认为，五四运动证明了克鲁泡特金的所谓“一次暴动胜于千百万册书报”之说的正确。此外，他的苏俄之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改变环境，发展个性”的“内的要求”无法满足而“决然想探一探险”的驱使。这并不奇怪，因为此时的瞿秋白还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悲观失望的感伤情绪还常常在他身上体现出来。

在这里，我们还须指出，正如将赴俄前的瞿秋白说成是社会主义者一样，那种为证明他是“老机会主义者”而说他早期“信奉……无政府主义”<sup>⑤</sup>也是不客观的。开始接触和研究社会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者之间，固然不能同日而语，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个别观点与“信奉无政府主义”，也不能简单地打上等号。“五四”前后的中国，各种各样的思潮都有它一定的市场，影响着一代青年。不错，包括无政府主义在内的一些学说也在瞿秋白的头脑中打下了烙印，但难能可贵的是，正是在对于这些纷繁的学说的探索中，瞿秋白越来越向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靠拢。他认识到，为要达到“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当然，对共产主义最终理想作这样理解，是片面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sup>⑥</sup>。瞿秋白赴俄前夕的这种见解，无论怎样，都是和“信奉无政府主义”连不上的。

一九二〇年十月十六日，瞿秋白与《晨报》同人李宗武、喻颂华开始了苏俄之行，次年一月二十五日夜，抵达莫斯科。一九二二年二月，瞿秋白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先后出席了远东民族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苏俄期间，瞿秋白除了撰写《赤都心史》和另外一些旅俄通讯外，主要活动是帮助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担任东方大学的翻译和助教。

在莫斯科的近两年时间，对于瞿秋白是十分重要的。在这期间，他由一个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逐渐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然而，有人却认为：在瞿秋白的一生中，从未存在过这种转变，以至于连他的入党也成为“怀着‘英雄大圣人’资产阶级野心家的目的”了<sup>⑦</sup>。这种轻率而又粗暴的结论，是历史研究中应该坚决反对的。原因很简单：研究历史和历史人物需要的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是根据自己需要随意

地往研究对象头上扣帽子。对于上述宣判，长眠地下四十四年的瞿秋白当然不可能醒转来加以辩解，但记叙他苏俄之行韵《赤都心史》却还可以帮助我们理出一条他入党前后的思想线索——虽然，不那么完整，但也能够说明问题了。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当时的一些记录吧：

当“神秘的俄罗斯”展现在瞿秋白面前的时候，他写道：“灯塔已见，海道虽不平静，拨准船舵，前进！前进！”<sup>②</sup>不过，此时他拨准的“船舵”，却还对准着“理智的研究”，而这种“理智的研究”，又首先着眼在“新旧俄罗斯的民族文化”上。在这里，新、旧的含义，是不言自明的。瞿秋白没有对我们说他是如何研究并研究了些什么。但不久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那将来主义，……资产阶级文化的夜之余，无产阶级文化的晨之初；他是春阑的残花，是冬尽的新芽，……夜阑时神昏意怠的醉荡之舞，看来已是奄然就息；那黎明后清明爽健的劳作之歌，还依稀微忽……悄悄地里偶然遥听着万重山谷外‘新曲’之先声，又令人奋然振发，说：黎明来临……”<sup>③</sup>。从瞿秋白称马雅可夫斯基为“将来派”诗人，我们可以看出，“将来主义”是瞿秋白给十月革命后崭新的苏维埃文化下的定义。这个定义显然是偏颇的；所谓“夜之余”“晨之初”一说，也有混淆两种文化不同性质之嫌，但他正确地指出了“旧”文化的衰落和“新”文化的兴起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因为，前者的衰落是由于“资产阶级经济地位动摇”<sup>④</sup>，后者的兴起则是因为“无产阶级经济力量取得”<sup>⑤</sup>。瞿秋白已经朦胧地认识到：经济基础与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上层建筑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比他几年前看到中国“文学思潮的堕落”却苦于找不到原因，显然是前进了一大步。

瞿秋白十分关心列宁提出的苏维埃新经济政策。一九二一年五月下旬，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列宁最近指出四种苏维埃制度中之国家资本主义：（一）、租借地，（二）、协作社，（三）、商人，（四）、企业家（和家庭小工厂）。现第四次全俄职工联合大会及最高国民经济苏维埃正在讨论之中，此种过渡办法甚有味”<sup>⑥</sup>（着重点为引者所加）。为什么瞿秋白会产生有味之感呢？因为，他赴俄以前及赴俄初期所听到所见到的“没有吃、没有穿，……饥、寒”的“饿乡”，后来由于“国内战争停息，新经济政策实行，生活也就宽裕了”<sup>⑦</sup>。同年四月十一日，他在《赤都心史》中，以题为《俄国式的社会主义》的一整节，专门谈到了苏俄的经济状况。他引用苏俄通商人民委员会一名高级负责人的话说：“没有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况且决不能在隔离状态中实行新村式的共产主义……当然，而且必须……发展工业，培植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本”。

瞿秋白对苏俄的观察是细致的，而且是多方面的。从与苏俄党政领导人的会晤到访问幼儿园，从参观托尔斯泰的故居到参加红场上的五一庆典。这一切，都给他以新鲜的感觉和深刻的印象。然而最给他“一深切的感想”的却是第一次见到列宁。这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上，“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出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着人山。电气照象灯开时，列宁伟大的头影投射在共产国际‘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等标语题词上，又衬着红绫奇画——另成一新奇的感想，特异的象征。……列宁的演说，篇末数字往往为霹雳

的鼓掌声所吞没”<sup>②</sup>。从这一段热情洋溢的记载中，我们已经看得出来瞿秋白是站在他赴俄前所设想的“理智的”旁观者的角度上了。他于当年八月二十九日的一段文字，更有助于证明我们的判断：“东俄旱灾非常之甚。……劳农政府设着种种方法力图救济。……欧洲的资本家还想借此鼓动阴谋”。毫无疑问，对于“东俄旱灾”的同情以及对于“欧洲的资本家”的愤慨，显然已经不仅只是站在一般的人道主义的立场上的呼吁了。

众所周知，当时国际资产阶级，对于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而瞿秋白却以有说服力的事实，给种种流言以迎头痛击。如果说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仅仅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向西方世界客观地报道了十月革命的实况，那么，瞿秋白的《赤都心史》则充满激情地向中国人民展示了一幅苏俄人民在列宁领导下，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图画。他无所畏惧地将自己鲜明的爱憎和政治倾向写进了《赤都心史》。这表明，通过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通过对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察，瞿秋白的人生观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他在访问一个普通的华侨工人后写道：“他们——非智力的劳动者，——即使有困难苦痛，大概永没有我这一种‘烦闷’呵”<sup>③</sup>。行文至此，不禁使我们想起鲁迅先生在谈到自己由进化论向阶级论转变的一段话来：“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做蜗牛，好象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分子的坏脾气”<sup>④</sup>。当然，比喻往往是不那么确切的，鲁迅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战士转变的道路也与瞿秋白不尽相同。但是，这毕竟说明，同样出身在破落大家庭的鲁迅和瞿秋白，正确地估价了“士”的家庭在自己思想上的影响，看到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形成有一个长期的、痛苦的磨炼过程，所以他们能够不留情面地解剖自己，得出的结论同样的中肯和惊人的相似。它表明了他们在认识上有了一大飞跃。正是这种认识上的飞跃，使瞿秋白毅然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我”不是旧时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sup>⑤</sup>！而在这“新时代”的战斗阵营里，瞿秋白认为，自己虽然“只能当一很小很小无足轻重的小卒，然而始终是积极的奋斗者”<sup>⑥</sup>。这真可以看作是瞿秋白的入党誓言。因为在写下这些话两个月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瞿秋白开始了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生涯。而在不久之后的五卅运动和大革命时代，他已成为“党内有威信的领导人之”，即使在遭受王明路线“打击以后仍然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sup>⑦</sup>，并且一直“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sup>⑧</sup>。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sup>⑨</sup>。瞿秋白在“五四”时期的活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论断。正是“五四”这个前所未有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结束了瞿秋白在黑暗中的彷徨，使他最终实现了寻求“光明的路”的愿望。瞿秋白的成长过程，是和五四运动分不开的。他在“五四”时期的贡献，又使自己的名字铸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块里程碑——“五四”的丰碑。

#### 〔注释〕

①②④⑤⑥⑦⑩⑪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均见《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一卷三页——九十三页。

③鲁迅小说《在酒楼上》中的人物。

（以下转入43页）

资本主义的资本家强权。如果不是坚决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是根本办不到的。这与李大钊同志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可见,毛泽东同志要建立的“有生命的文学”,当然不是封建主义的文学,也决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学,而是无产阶级的文学。这是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又一个鲜明的标志。

综上所述,胡适的“八不主义”虽然在历史上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陈独秀的“三大主义”还起过较大的进步作用,但就其实质而言,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范畴,因此,他们的主张是属于旧民主主义文学革命的尾声,不是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学革命开始的标志。只有李大钊、毛泽东等同志的主张,才标志着中国的文学革命由旧民主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只有他们才是“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他们的文学主张不仅充分地体现了“五四”时期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而且指明了文学革命运动的社会主义方向。

### 注 释

①《新民主主义论》。

②《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

③胡适在一九一七年一月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中说“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一九一八年四月,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又把“八事”归纳成“八不主义”,即:

“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四,不用套语烂调。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六,不做不合法文的文字。七,不摹仿古人。八,不避俗字俗语。”

④陈独秀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中说“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一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

国民文学;二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三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⑤《新民主主义论》。

⑥《我的歧路》。

⑦《独立评论》。

⑧《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⑩《胡适文存》卷1。

⑪《无声的中国》。

⑫⑬《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⑭《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⑮《尊孔与复辟》。

⑯《本志宣言》。

⑰《实行民治的基础》。

⑱《人生真义》。

⑲⑳《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 (上接37页)

⑳㉑㉒见《多余的话·历史的误会》。

㉓㉔见郑振铎《论瞿秋白同志早年二三事》,载《新观察》一九五五年第十二期。

㉕㉖见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五日《文汇报》。

㉗见《多余的话·我和马克思主义》。

㉘㉙㉚㉛㉜见《赤都心史》,《瞿秋白文集》第一卷九十五页——一九六页

㉝见丁景唐《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六月版。

㉞见鲁迅《二心集·序言》。

㉟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㊱《陆定一同志关于瞿秋白同志生平的报告》,载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㊲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六七一页——六七二页。

(本文作者系我院中文系学生)